

抗战时期女参政员的国民参政运动述论

宋青红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杨浦 200093)

摘要: 抗战时期共召开了第一、二、三届及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数额位居历届妇女参政人数之首,达 20 名之多。女参政员多为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年女性,其中未婚女性占有很大比例,所从事的职业以教育和妇女工作为主。她们的提案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战争动员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达 25 条之多,既有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有争取、维护妇女自身权利的提案。

关键词: 女参政员; 妇女参政; 妇女权利; 宋美龄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4-0119-08

A Review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ONG Qingho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angpu,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irst,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and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ourth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are hel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bout 20 women are elected as delegates, the highest number of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The female participants are mostly middle-aged women with a bachelor degree, and a relatively proportion of them is unmarried women, who mainly are engaged in professions of education and work concerning women. Their proposals relate to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culture, health, war mobilization and so on. There are 25 proposals on women's issues, both for mobilizing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striving for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women themselves.

Key words: female suffragist; women suffrage; women rights; Madame CHIANG Kai-shek

民国初年,受西方国家妇女参政思潮的影响,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蓬勃发展。^①1930 年前后,关于世界各国妇女参政的书籍大量翻译和出版^②,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了战前及抗战时期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

① 已有的研究较多的涉及清末民初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妇女参政问题。如张莲波《1922 年前后中国妇女参政的特点》,《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蒋婷薇《民国元年的妇女参政运动》,《江海学刊》2001 年第 4 期;李细珠《略论民初女性对性别歧视的觉醒与反思——以女子参政权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张军亭《20 世纪初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周亚平《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历史档案》,1993 年第 2 期;金炳亮《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研究》,中山大学 1989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 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书籍大量翻译并出版,如夏承尧《各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海启智书局,1929 年第 3 期;森口繁治著《妇女参政运动》,刘絮敖译,商务印书馆,1932 年;李藕丹《世界各国妇女参政运动概述》,上海女子书店,1935 年。

收稿日期:2013-03-21

基金项目: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编号:13CZS036)

作者简介:宋青红(1982-),女,江西永丰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女性史、民国政治与人物。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的数额及其所占比例,都居历届妇女参政运动之首。女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各项提案及在参政会之外的各项活动,扩大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也深化了人们对妇女参政运动的认识。

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研究成果,以张玉法、李木兰(Louise Edwards)等人为代表。张玉法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参政权的演变》一文,分时段、区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妇女参政思想及妇女争取参政权的发展演变过程。^{[1] (p39-72)} 澳大利亚学者李木兰(Louise Edwards)的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一书,系统的介绍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历程,提及国民参政会中的女参政员争取妇女代表权及代表名额所做的努力,她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挑战了中国几百年来最基本的政治权力准则,通过公开要求女性的政治声音,妇女运动者推动了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进程。^{[2] (p334)} 李木兰(Louise Edwards)并考察了战争对妇女参政的影响,她认为抗日战争为中国妇女参政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机会,战争并没有向妇女与正式政治力量和领导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关系提出挑战。^{[3] (p220-226)} 具体到抗战时期的妇女参政,洪宜嬪、夏蓉、郭昭昭都有所涉及,郭昭昭关于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涉及到战时的妇女参政运动领导者,但她侧重探讨国民参政会的主体,国民政府对女参政员的笼络。^① 本文拟结合各位女参政员的个性特点和参政经验,探讨抗战时期参政运动领导者的参政活动及其对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一、女参政员的选举产生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国民政府一个民意咨询性质的议政机关,自 1938 年 7 月成立至 1948 年 3 月结束,总共开过 4 届 13 次会议。1937 年 8 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由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聘请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为参议会参政员,作为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在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共召开第一、二、三届及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均有女性参政员参加。

根据 1938 年 4 月通过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年满三十岁,暨第三条所列(甲)(乙)(丙)(丁)四项资格之一者,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三条(甲)项规定“由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共选任八十八名,各省市所出参政员名额,依照附表之决定,并以有该省市籍贯者为原则。”(丁)项规定“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五十名”。^{[4] (p46)}

对于女参政员的名额,各界妇女团结及组织,纷纷请求增加名额,1940 年 10 月 9 日,国民大会全国妇女竞选会呈国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敬恳本扶助女权发展之政策予以切实扶助: 1. 请求在指定参政员名额中于前次呈送之各省市妇女国大代表候选人三百八十人内遴选五十名为第二届参政员; 2. 请求命令各省市参议会选举参政员时应注意选举女参政员每省市至少选出一人。3. 请求命令未成立参议会之省市党部及政府在推选参政员候选人时注意尽量推选当地妇女,每省市不得少于二人……”^[5]

1940 年 10 月 15 日,国民政府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公函(渝文字第三九六六号):“逕启者,承国民政府、主席交下国民大会全国妇女竞选会呈为请求在第二届参政员名额中,尽量指定妇女参加一案,承谕批送国防最高委员会并交行政院等因除分函外,相应抄同原呈,函达查照转陈为荷。”^[6] 1940 年 5 月 17 日,国民政府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渝文字第 2093 号“逕启者准贵厅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国治字第 9808 号公函为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建议关于请政府注意凡妇女所能服务之公

^① 洪宜嬪著《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台北国史馆 2010 年 10 月印行;夏蓉《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与妇女宪政运动》,《民国档案》2009 年第 2 期;郭昭昭《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

职,应尽量任用妇女一案,经陈奉国防最高委员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决议“送国民政府注意”录案检件函达查照转陈等由,业经陈奉国民政府通令直辖各机关注意矣,相应函复查照转陈为荷。”^[6]

最终选出的各界女参政员不过十数名。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选出女性参政员邓颖超、喻维华、史良、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衡、张肖梅、陶玄等10人,除伍智梅和罗衡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甲)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广东和云南省外,其余八位女参政员都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出来的。^{[4] [p66,68]}

第二届参政员中女参政员分别为邓颖超、史良、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衡、张肖梅、陶玄、曾宝荪、吕云章、陈逸云、张维桢、谢冰心、钱用和等15人,全部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出来的。^{[4] [p784-786]}。第三届女参政员分别为邓颖超、伍智梅、刘王立明、吴贻芳、刘蘅静、罗衡、陶玄、吕云章、陈逸云、张维桢、谢冰心、张邦珍、胡木兰、唐国桢等14人,除张维桢、刘王立明、张邦珍、胡木兰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甲)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江苏、安徽、云南、广东省,其余10人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出来的。^{[4] [p1056-1060]}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女参政员共有唐国桢、张维桢、张邦珍、王化民、陈逸云、陶玄、吕云章、谢冰心、伍智梅、邓颖超、罗衡、吴贻芳、刘蘅静、胡木兰等14人,除唐国桢、张维桢、张邦珍、王化民四人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甲)项遴选出来,分别代表湖南、江苏、云南、河北省,其余10人是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丁)项遴选出来的。^{[4] [p1422-1426]} 各女参政员情况简介如下:

表1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情况简介

姓名	学历、身份、职务及经历等	党派
邓颖超	天津第一女师毕业;周恩来夫人,妇运领导者,陕甘宁边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共产党员
史良	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律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历任江苏区长训练所训育员,青岛特别市党部政训科主任,江苏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总司令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指导员,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等。	民盟成员
吴贻芳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教育家,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兼英语系主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无党派
伍智梅	伍汉持之长女,毕业于广州夏葛医科大学,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实习;广东妇运领导者,历任广州市参事会参事,广州特别市党部第一届妇女部长,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员,广州市政府设计委员。	国民党员
张肖梅	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继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又入日内瓦大学,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经济学家,张嘉铸(禹九)夫人,历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四川省政府经济顾问,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民党员
刘王立明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理学学士,前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曾努力于妇女运动多年,在上海曾创办中华妇女节制协会。	1944年加入民盟
罗衡	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入法国巴黎大学地理专门学院;独身主义者,任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央社会部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员
陶玄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历任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及立法院立法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妇女处处长。	国民党员
刘蘅静	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历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广东执信中学教员,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妇女部长,汉口市党部妇女部长,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员
喻维华	武昌中华大学毕业;任香港西南女子中学校长,国民会议代表。当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后,即赴汉口参加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不幸在汉口寓所遇刺身死。	青年党
谢冰心	燕京大学毕业,曾入美国威斯里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全国妇女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燕京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	民进成员
陈逸云	192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科系,1932年由国民党党部保送,官费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市政管理硕士;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院秘书、铁道部专员、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委员等职。	国民党员
吕云章	北京女子高师毕业;暨南大学讲师周书龄夫人,历任中央党部妇女干事、上海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河北省任教育厅督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务课主任、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校长等职。	国民党员

姓名	学历、身份、职务及经历等	党派
钱用和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由江苏省政府派公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学习;历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董秘书,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授。	国民党员
张维桢	早年在沪江大学毕业,后留美密歇根大学,学政治;罗家伦夫人,历任中央宣传部编辑科科长,上海纱厂总工会主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妇女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领导中央大学妇女工作。	国民党员
曾宝荪	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曾国藩曾孙女,教育家,湖南艺芳女子中学校长,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	
胡木兰	广州大学毕业;胡汉民之女,任国民政府经委会委员。	国民党员
唐国桢	北平女师大毕业,曾派赴日本民治大学研究教育;历任宁夏省立女子中学校长,湖南衡山县立女子中学校长,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总干事,妇女慰劳总会总干事。	国民党员
张邦珍	早年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1929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张邦翰之妹,历任云南南菁中学校长、云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立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等职。	国民党员
王化民	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历任察哈尔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院校长、国立河南中学校务委员等职。	国民党员

资料来源: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第 66-68、781-786、1506-1061 页;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第 288-405 页;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国民参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1962 年;《十五位女参政员介绍》,《妇女新运通讯》,第 3 卷第 3-4 期,1941 年 2 月,第 4-5 页;《中国女的参政员》,《妇女新运》,1943 年第 3 期,第 42-44 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年。

国民参政会的女参政员,多具有一定学历、职务或身份背景或政治地位。各位女参政员大多为三四十岁的中年女性,且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从其学历来看,他们多具有师范、大学以上的学历,有不少还曾留学海外。各位女参政员中,未婚女性占很大比例,且以从事教育及妇女工作的占绝大多数。^{[7][p7]}各位女参政员的个人经历对于其当选为女参政员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女参政员多为国民党员或与宋美龄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即女参政员之所以能当选与其政治派别,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表 2 第二、三届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统计表

	人数	第二届 15 人	第三届 14 人
年龄	40 岁以上	9	8
	40 岁以下	6	6
	教育界	4	3
	妇运工作	8	9
职业	生产事业	1	1
	文化事业	1	1
	经济学家	1	
	已婚	8	8
婚姻	未婚	7	6
	留学生	12	11
学历	大学生	2	2
	师范生	1	1
	国民党	8	10
	共产党	1	1
党别	其他党派	1	
	不详	5	3

资料来源:陈逸云《女参政员的话》,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史研究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1940 年 5 月 16 日-1947 年 2 月 16 日),第 7 页。

从表 2 可知,国民参政会中女性参政员,多出生于 1900 年前后,到 1938 年 7 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时,大多 40 岁左右,但未婚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第二届 15 名女参政员中,7 人未婚,第三届

14名女参政员中6人未婚。这些未婚女性,绝大多数终身未婚,如吴贻芳、罗衡、曾宝荪等人。从学历来看,女参政员具有师范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大多数具有留学背景。她们的职业以教育和妇女运动工作为主,在党派属性上,国民党员占绝大多数。

具体来说,邓颖超是代表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女代表,她是“有悠久历史的妇女运动者”,“她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在北伐时代,曾领导上海的女工与女子去进行五卅的流血斗争,曾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并与何香凝女士共同担任妇女部工作。国共分裂后,她脱离了国民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8] (p5)} 1937年7月,邓颖超和其它五位共产党参政员,“捐献所领参政员公费”^[9]。邓颖超发表题为《论女参政员的责任》一文,写道“女参政员要代表全国人民将意见转达政府,为最受压迫、最受痛苦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这次会议期间,讨论议案要注意关心妇女问题”。

罗衡原名罗云英,云南省盐丰县人,曾入昆明女子师范大学附小读书,毕业后考入女师,后因抗婚,改名罗衡,换上男装,逃出昆明,经越南绕香港到上海,再转往北京,进入大学政经系学习,后又到广州进妇女运动讲习所。罗衡于1926年3月19日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等职,并“长期兼任宋美龄的私人秘书”^{[10] (p61)}。在参政会上,罗衡“敢于讲话,她披露了宋子文的罪恶,斥责过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反对过孔祥熙的贪污,揭发过孙科的丑闻,成了一个有名的‘炮手’和有强烈正义感的奇女子。”^{[11] (p167)} 史良是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宪政期成会“唯一的女性”^{[12] (p23)},为了担任国民参政员,暂停了律师业务。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被迫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首次会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许多同志,也宣布拒绝出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表示坚决抗议”。1942年国民党召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史良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同时被取消参政员资格。^{[4] (p476)} 陈逸云是《妇女共鸣》的编辑,“但她平时特别热心于妇女运动,崔英秀案,李鲁慕贞案,她都站在妇女界的立场,为之奔走呼吁”^[13]。她自称“小妹妹”,在女参政员中,她是“较为年轻”,“颇具风趣”。^{[14] (p96-98)} 钱用和“曾为蒋夫人私人秘书”,她认为女子教育,应注重培养人才,对于职业、家庭,应双方兼顾,设法补救,妇女职业问题,“回厨房”与“走出家庭”,应视环境而定。^{[15] (p30)} 陶玄曾任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校长。1938年7月4日,陶玄在在武汉召开的各界妇女谈话会上,宣称“我们(指女参政员——笔者注)虽不是由全国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但我们愿意代表全国女同胞,把全国女同胞的呼声传到参政会和政府中去。”^[16] 1938年,喻维华曾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马超俊夫人沈慧莲等往第五战区劳军,1939年7月29日晨七时半,“被刺身死”于其居住的武汉特二区黄陂路七十四号^[17]。胡木兰早年“追随乃父从事革命工作有年。革命军兴后,女士在港襄助妇女慰劳工作”^{[18] (p44)}。此外,伍智梅是具“有长久历史的广东妇运的领导者”,曾宝荪“中学根柢甚佳,蒋夫人颇器重”^{[8] (p5)}。

由于背景不同,各位女参政员对民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1944年,记者在曹孟君主办的《现代妇女》杂志发表《女参政员谈民主》一文,详细记载了各参政员对民主宪政的态度。有的认为“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够”,宪政应缓慢实行,以国民党员刘蘅静、陈逸云、胡木兰、唐国桢、罗衡、陶玄、张邦珍、伍智梅等人为代表。^{[19] (p26-27)} 也有人主张民主须“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如史良曾说“民主是用不着学习的,所以不能拿学习来比喻‘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无论有知识与否,每个人都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官吏是由主人请来代为管理财产的公仆,假若仆人有误,主人是有权来更换的,打个浅近譬喻,一个穷老太婆,总也会照顾自己的财产,谁要损害到她的财产,她也会分辨得出谁是好人坏人。所以惟其实行了民主的选举,才能真正到除贪污呢!”她更谈到,“中国民主与英美不同的地方,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而可以实行民主,中国却是有法不守。所以如其实行宪政,更必须形式与内容并重,一方面要彻底的人身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以真正表现民主的内容,另方面也须召开国民大会分布宪政争取形式上的民主,来定下个契约不可”。^{[19] (p27)}

而胡木兰对妇女参政的意见有三:“第一,假如我国妇女问题成为问题的话,那是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因此,妇女参政,应该用国民所付予之能,透过政府之权,以求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其次,妇女与男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界线之权利义务,已在国家立法上加以规定,因此,妇女对于国家社会,应该是以国民一分子之身份贡献于国家社会,和男生同样站在本身所应站的岗位,绝不应事事强调性的差别

问题,使自己自成一特殊阶级……最后关于我国妇女始终不能和男性同质同量贡献国家社会之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然而这种事实之根因,一是我国原有社会机构之阻力,一是妇女本身生活技能之不能,因此,今后女参政员对于政治上之运用,应对于排除社会助力与提高生产技能二方面多加注意。”^{[15] (p19)}应该说,胡林木兰关于妇女参政的观点是非常温和的。

二、女参政员参政议政

在每届国民参政会前,女参政员参加妇女界集会,集思广益,以确保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妇女的利益。既有各妇女团体代表邀请女参政员参加集会,讨论提案等问题,也有女参政员邀请各妇女团体或个人建言献策。如1938年7月4日,女参政员陶玄、罗衡、邓颖超、史良、刘衡静等召开招待各界妇女谈话会,到会的有武汉各妇女团体、全国女青年会乡村服务团、河南各妇女团体、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及香港、甘肃、东北等地来的妇女代表一百余人各团体代表相继发言,提出许多有关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问题的提案。^[16]

1938年10月26日,第二次参政会开会前夕,妇女慰劳总会重庆分会邀请刚从武汉来渝的女参政员邓颖超、史良、刘衡静演讲,以了解参政员关于这次参政会的意见,“到会的妇女同胞约五百余人”^[20]。1938年10月31日,武汉市妇女慰劳分会、妇女抗战建国协会、儿童保育院举行茶会,招待出席国民参政会六位女参政员刘衡静、邓颖超、吴贻芳、罗衡等人,会议由武汉抗战建国协会主席朱纶主持,“一方面想听一听六位参政员将有什么意见提给参政会,一方面并希望她们三个团体的意见贡献六位妇女界先进,请他们转达到参政会上去,此外,更希望请教对妇女救亡运动的指示。”^[21]女参政员通过妇女座谈会及时了解妇女界的动向,及时反应妇女代表的意见,并起上传下达的作用。

1938年,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拟定《动员农村与家庭妇女》草案,“交请此次来渝出席女参政员提出大会讨论施行”。^[22]1940年4月6日,重庆市33个妇女团体代表举行招待女参政员大会,除刘王立明因事未参加外,邓颖超、史良、吴贻芳、陶玄、罗衡、刘衡静、伍智梅、张肖梅等八位参政员参加。^[23]女参政员定期召开妇女各妇女团体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以代表广大妇女参加参政活动。在妇女座谈会基础上,女参政员代表广大妇女在国民参政会上纷纷建言策。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提案达92条之多,其内容涉及优待抗敌军人、发展农村工业、加强军医力量、救济抗敌军人家属、改进女子教育、政府预算规定妇女工作经费、不得禁用女职员、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加强救护工作、推行公医制度等各个方面。可见,女参政员关注的问题不限于妇女问题,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战争动员等纷纷建言献策。比如,一届二次参政会,史良提议“请政府切实执行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法令以便人民安心服役案”、“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一届三次会议提议“集中全国医药卫生专门人材加强军医力量以适应战时军队卫生及救护工作之需要案”等。^{[4] (p186-1323)}

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提案不限于妇女问题,但涉及妇女问题的提案约为25条,占女参政员所有提案92条的约四分之一,可见女参政员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既有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争取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提案。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如在一届一次、一届二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一届三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中央及各省县市农业机关应尽量辅导农村妇女发展生产事业案”。一届四次会议上刘王立明等提“请政府普遍设立托儿所以便利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业案”,史良等提“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一届五次会议上,伍智梅等提“请政府通令各省切实推广妇女纺织业以利战时生产案”,刘王立明等提“请中央速组妇女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加强战时经济案”,伍智梅等提“请政府推进妇女代耕以增战时粮食生产案”。三届一次会议上,唐国桢等提“请政府实施妇女动员,加强抗战力量案”,刘衡静等提“请政府从速普设工厂托儿所,以动员妇女参加工业生产案”。三届二次会议上,唐国桢等提“请修改《国民义务劳动服务法》,加入妇女部份,以增强抗建力量而符合实际动员全国人力之要义案”。三届三次会议上,唐国桢等提“为促进妇女参加各部分工作以增国力案”。^{[4] (p186-1323)}

维护妇女权利的提案如一届五次会议上刘衡静等提“请政府于指定之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中多指定

女代表以弥补区域选举之缺点案”,史良等提“请政府于各级政府预算中规定妇女工作经费以利妇运案”,史良等提“请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不得禁用女职员案”。二届二次会议上,吴贻芳等提“请政府明令各机关不得藉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案”,陈逸云等提“请政府明令警官学校及警政训练班招收女生,以符男女教育职业机会平等之原则案”,刘蘅静等提“请规定母亲扶助法以保护幼小儿童案”。三届三次会议上,吕云章等提“请通飭各机关不得歧视或拒用女性职员案”,刘蘅静等提“宪政实施协替增加女委员二人案”。

四届一次会议上,刘蘅静等提“政府增加国民大会女代表名额”,唐国桢等提“请政府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暨各省市县参议会参议员妇女名额应为总数百分之二十比例案”,罗衡等提“再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妇女职业以免造成社会之严重问题案”,陈逸云等提“提议宪法草案所规定各项选举应规定妇女当选名额案”,王化民等提“为便于妇女就业增加建国力量应大量培植幼稚教育是将普设托儿所案”。^{[4] (p186-1323)}而提案涉及妇女问题的并不是全由女参政员提出的,男参政员的提案中涉及妇女问题,如王亚明等所提“推行妇女生产合作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战时生产及战后经济复兴案。”^{[24] (p485)}而张之江等为妇女争取权利所提“健全托儿所机构增加托儿所数量切实保婴便利妇女工作案”^{[24] (p488)}。

以上25条女参政员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既有动员妇女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的提案,也保障和维护妇女权利的提案。当然,关注妇女问题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性参政员的提案中,也有涉及妇女问题的提案,如王亚明和张之江等的提案。^{[24] (p485、488)}总体而言,女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活动,为战时国家建设和妇女权利的争取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各女参政员的提案,时人反应较为犀利。1943年9月25日,《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午后蒋先生出席参政会,谓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以推动一切宪法筹备工作……女参政员于蒋先生讲毕时发言,要求政府立即给予人民以较多之自由,并谓现时情形,人民不但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抑且无‘旅行自由甚或吃饭自由’云云。本党同人闻之均感不快,惟枚荪语予云,我们对于此种批评,也只好忍受。”^{[25] (p540)}女参政员在参政会中的表现也将为优秀。据1942年11月30日,《王世杰日记》记载:“参政会今日上午下午大会均由吴贻芳女士主席,吴女士主持会议之能力较张伯苓、莫德惠等均优。”^{[25] (p464)}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国民参政会中有无女参政员参加,女参政员的比例及各项提案对民国时期乃至1949年之后的妇女参政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国民参政会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选出后,1938年6月25日史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评论“参政会的代表约二百多人,其中妇女占二十分之一。数量虽不算多,较之以前是大有进步。而妇女能积极参政,实为前所未有的。主要能见诸实行。妇女方面的提案,尚须与其他女参政员商酌,大体上有下列各项:妇女须能受普遍的军事及政治的训练,得到良好的保育,以及希望各级政府机关能尽量吸收妇女工作人员,使妇女能参加抗战及建国工作等。”^{[4] (p92)}

然而,妇女参政员在整个参政员中所占比例仍非常小。四届一次会议上,唐国桢提“请政府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暨各省市县参议会参议员妇女名额应为总数百分之二十比例案”。^{[4] (p186-1323)}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五左右。女参政员史良指出“妇女工作,目前所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民众团体往往从政府取得帮助太少。像经费的困难,领导的不够,都加重妇女工作及民众运动的困难。”^[26]各种因素制约了战时及战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政治因素,一些进步的女参政员被取消参政员资格。如史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同与中共参政员“被迫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之后史良“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二年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时,国民党取消史良等人的参政员资格。^{[27] (p47)}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的女参政员以自身的参政实践,为妇女争取参政名额。抗战结束后,女参政员们继续领导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邓颖超于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继续领导妇女参政活动。其他女参政员中,伍智梅、罗衡、陶玄、曾宝荪、吕云章、陈逸云、钱用和、张邦珍、唐国桢、王化民等人当选第一届“制宪国民大会”代表。^[28]吕云章出席“制宪国大”极力争取民意代表中应有妇女保障名额的提案,提案并获通过。^{[28] (p601)}吴贻芳虽被国民

党选举为国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但“坚辞不就”。^[29] (p121-122) 此外,女参政员伍智梅、唐国桢、吕云章、陈逸云、罗衡、王化民、刘蘅静等人当选为第一届女性立法委员,^[30] 钱用和等人当选为第一届女性监察委员^[31]。战后妇女仍在继续为争取参政的权利而奋斗。

参考文献:

- [1] 张玉法.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参政权的演变 [A]. 吕芳上. 无声之声 I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 [M].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 [2] Louise 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xii pp.
- [3] 李木兰. 战争对现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 “危机女性”的问题 [A].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4] 孟广涵. 国民参政会纪实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5.
- [5]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修正暨秘书处组织规则案 [B]. 台北“国史馆”, 001000000094A—001011130003010a—001011130003018a.
- [6]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案有关内政案 [B]. 台北“国史馆”, 001000000119A—001011130028095a.
- [7] 陈逸云. 女参政员的话 [A].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史研究组. 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 [Z].
- [8] 十五位女参政员介绍 [J]. 妇女新运通讯, 1941 (3 A).
- [9] 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启事 [N]. 新华日报, 1938-7-20.
- [10] 罗家楷. 我记忆中的罗衡 [J]. 楚雄方志通讯, 1986 (2).
- [11]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2] 嘉. 三位女参政员谈宪政 [J]. 现代妇女, 1944 (1).
- [13] 浦熙修. 女参政员速写 [A]. 袁冬林, 袁士杰. 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0.
- [14] 彭子冈. 女参政员之声 [A]. 子冈作品选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 [15] 介绍新女参政员 [J]. 江西妇女, 1941 (2).
- [16] 波. 武汉妇女界盛大集会 [N]. 新华日报, 1938-7-5.
- [17] 参政员喻维华被刺 [N]. 新华日报, 1938-7-1.
- [18] 中国女的参政员 [J]. 妇女新运, 1943 (3).
- [19] 女参政员谈民主 [J]. 现代妇女, 1944 (5 6).
- [20] 渝妇女界昨欢迎女参政员, 邓颖超、史良、刘蘅静演说 [N]. 新华日报, 1938-10-27.
- [21] 春江. 招待女参政员茶会席上 [N]. 新华日报, 1938-11-1.
- [22] 渝妇女界请提出动员案 [N]. 新华日报, 1938-10-29.
- [23] 渝市各妇女团体昨招待女参政员 [N]. 新华日报(重庆), 1940-4-7.
- [24] 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 国民参政会史料 [M]. 台北: 国民参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 1962.
- [25] 王世杰. 王世杰日记 [M]. 林美莉编校.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
- [26] 对第四届参政会的意见 [N]. 新华日报, 1939-8-25.
- [27] 史良. 史良自述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 [28] 刘国铭. 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 [29] 钱用和. 半世纪的追随 [Z]. (作者自印), 1976.
- [30] 立法院立法委员名鉴编辑委员会. 第一届立法委员名鉴 [M]. 台北: 立法院立法委员名鉴编辑委员会, 1953.
- [31] 监察院秘书处. 监察院第一届监察委员名鉴 [M]. 台北: 监察院秘书处, 1954.

(责任编辑: 吴 贇)